

文揚：習式改革對世界都具有正面示範效應

習近平執政兩年，最顯著的成就是大力推動了中國的改革，並且不是如很多人士期望的那種越來越接近西方模式的改革，而是按照“不犯顛覆性錯誤”，“不走老路，不走邪路”、“堅持黨的領導”這種既定原則進行的自主性改革，也是逐步落實十八大各項改革承諾的闡述式的改革。

為區別於中國“自由派”心目中處處以西方為標準的“西化改革”，不妨稱之為“習式改革”。

“習式改革”力度之大、效率之高，令人瞠目。僅簡政放權方面，2013年國務院取消和下放

行政審批事項416項，2014年317項，兩年合計733項，已提前完成了李克強當初許諾的本屆政府削減三分之一審批事項的任務目標。

而反腐方面，十八大以來，共有超過18萬人被處分，“一天三人落馬”的反腐節奏已成常態，包括四個“副國級”在內的省部級以上高官40多人被查處，是十八大以前的數倍。

其他還有包括了戶籍制度、土地制度、社保制度、金融體制、財政體制等重大領域在內的經濟和社會多方面改革，短短兩年里，都有了決定性的甚至是歷史性的突破。

自主改革才是硬道理

近日，隨着新加坡建國總理李光耀辭世，全世界將目光再次聚向新加坡。眾所周知，新加坡是在李光耀數十年的“精心養育”下長大的，為了打造一個全新的新加坡，李光耀可謂耗盡一生心血。如今，世間已無李光耀，新加坡何去何從？

然而，外界似乎不必為新加坡過度擔憂。就在李光耀先生離世前一周的3月17日，博鰲亞洲論壇秘書處在北京舉行新聞發布會，發布《博鰲亞洲論壇亞洲競爭力2015年度報告》，該報告顯示，2014年度亞太经济体綜合競爭力排名中，“亞洲四小龙”繼續領跑亞太，分列第一至第四位：新加坡、中國香港、韓國、中國台灣。其中，新加坡更是已連續數年排名第一。這個第一，足以告慰李光耀先生在天之靈。

看到這個排名，可能有香港人要表示“不服”了：香港怎可屈居第二？其實，新加坡的多項經濟社會指標早已超過香港，并且發展勢頭良好，而香港却不斷淪落，正面臨嚴重的結構性社會問題，許多港人看不到希望。越來越依靠大陸而漸不自強的香港已經是“溫水煮蛙”，再不能認清所面臨的形勢，那就快成為“井底之蛙”了。如果香港只是自我感覺良好，再不反思，不僅昔日榮光將被稀釋干淨，而且只会愈來愈沒落，而這絕不是每一個務實的港人所希望看到的局面。此刻，似乎也可以拿07年前總理溫家寶訪問新加坡時所言來提醒發問者，“邊看邊想着香港”，感到“形勢逼人”！

“硬碰硬”？香港已力漸不敵

各項經濟“硬指標”顯示，新加坡已呈壓倒香港之勢。

就新加坡內部，李光耀執政新加坡31年期間，新加坡這塊彈丸之地成功發展成發達國家。資料顯示，1960年新加坡人均GDP只有2530美元，在1990年李光耀辭任總理時，已上升至16554美元；2013年，更上漲至36898美元，接近1960年的15倍，人均GDP位列全球第九位。

而在與香港的橫向比較來看，新加坡在建國後大部分時間GDP總量和人均都落後於香港，但從2003年至今，新加坡人均GDP和人均GNI均明顯超越香港，且差距越來越大。從2010年開始，比香港少了近200萬人的新加坡在GDP總量上也已超越香港。這在新加坡經濟史上應當屬於標誌性的事件。而除GDP外，港坡兩地的整体競爭力差距也在逐步縮窄，曾在亞太经济体競爭力排名中數年保持第一的香港，近年也被新加坡搶去頭把交椅，包括香港引以為傲的“世界之最”的經濟自由度，也已為新加坡這個亚军所逼宮。如此種種，足以說明，昔日領先於亞洲的香港已經落後於新加坡，而這無疑應該引起香港的反思。

結構性社會問題“綁架”香港

香港與新加坡二者作為“亞洲四小龙”成

新加坡的崛起足以引發香港反思

員都創造過經濟發展奇蹟，但現在可以說，新加坡仍大步走在創造奇蹟的路上，而香港已停下脚步很久了。曾經創造經濟奇蹟的香港，目前正面臨諸多结构性社會問題，這也被認為是在消耗“香港奇蹟”老本。

在民生和社會建設等方面，比之新加坡，香港面臨的問題尤其突出。如在民眾最為關注的住房方面，雖然數十年兩地都為解決城市居民住房問題出台政策大規模建屋，時至今日，香港的住屋平均面積比起新加坡少一半，樓價却起碼高出兩三倍。與此同時，香港還有不同于新加坡的具有本港貧富懸殊標志的“籠屋”的存在，香港是一座富有的國際大都市，“籠屋”的存在與香港的繁華景象形成嚴酷對比，這可以說是港人的一種耻辱。

住房情況差異多源於兩地施政理念不同，新加坡“組屋”針對的不只是低收入階層，而是社會大多數，政府視協助大眾自置物業為己任。香港則只多安撫基層，提供廉租“公屋”予低收入市民，中產階級在住房上只能自求多福。不同政策理念所帶來的不同效果也顯示新加坡政策制定者比香港更多的前瞻性。

社會治理上，新加坡和香港都有良好的治安，相比較來說，新加坡在城市基礎設施、環境綠化、社會治安、低收入人群保障等方面做得比香港更好。特別在環境綠化上，新加坡政府高瞻遠矚，把新加坡打造成一個花園城市，不僅改善了人們的生活條件，而且向世界展示了良好的精神風貌和形象。新加坡通過實行多元種族、多元文化的融合政策，使不同的族群之間能和睦相處，做到這一點十分難能可貴。新加坡已成為“經濟發達、社會和睦、環境優美”的世界典範國家。

而香港卻在社會的“撕裂”中與新加坡漸行漸遠。近年來，香港與新加坡共同遭遇亞洲金融危機、“非典”病毒的挑戰，但各自受到的影響有所不同，回歸後的香港面臨的困難更多，最主要的表现為對新政治環境的適應性困難。由於一直不能處理好與大陸的關係，與內地政商利益糾葛不清，這使得香港陷於極大的內耗之中。

回歸後香港政治社會漸呈分化態勢，雖然政界不同聲音開始活躍但卻陷於爭吵不休之中，並引發各種政治運動，日益突出的政治分歧導致香港社會逐漸“撕裂”，而難以在危機關頭凝聚共識。而政制紛爭等因素造成香港政治前景不明朗也會影響香港投資環境，使外界對香港的形象趨向負面，從而影響投資者信心。因此，如果香港不能儘早擺脫

內部之間以及與大陸之間的這種“折騰”境況，它將難以保持現有的經濟繁榮局面而將被競爭對手遠遠的甩在後面。

如果說，李光耀逝世給香港留下什麼“遺產”，那麼可以說，新加坡的競爭對手身份就是留給香港最大的“遺產”。曹鳴評論

英國《金融時報》日前有評論文章稱：“我們很難再想到還有哪位世界重要領導人的政府，在如此短的時間內達成瞭如此多項成就。習近平當然可以因許多議題遭受批評，但未能兌現改革諾言並不在其中。”

環顧當今世界，各國都在改革，尤其是近年來深陷債務危機、金融危機和經濟停滯泥潭的西方各國，從美國到英國，從法國、意大利到日本，其政治領導人也無一不在大力呼籲改革、推動改革。但可以說，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夠像當今中國這樣，以一種說到做到、只爭朝夕的方式全面推進改革進程。如果有一個世界通行的“改革進度指標”，類似國內生產總值(GDP)，那麼中國近兩年在這方面的表現一定比中國的GDP還更加“一枝獨秀”，甚至是“一騎絕塵”。

習近平在2015年的元旦致辭中說：“全黨全國各族人民要團結一心，集思廣益用好機遇，衆志成城應對挑戰，立行立改破解難題，奮發有為進行創新，讓國家發展和人民生活一年比一年好。”

在今天的中國，“讓國家發展和人民生活一年比一年好”這一願望的可實現性，幾乎不受任何懷疑。而放眼四海，任何一個國家如果全國人民團結一心，並且能夠“集思廣益用好機遇，衆志成城應對挑戰，立行立改破解難題，奮發有為進行創新”，還有他求么？無論在歐洲、美洲，還是非洲、大洋洲，這不就是一個成功的國家、光明的國家、大有希望的國家了么？還用得着遷就其他什麼標準么？

這又回到了關於自由民主的陳詞濫調中。不用說，自由、民主、法治、人權、平等、公正，都是極美好的標準，但再美好也屬於人工造物，也一樣難逃久弊生、物極必反的鐵律。西方各國的經驗已經表明，自由一旦絕對化，政治早晚被資本所綁架；民主一旦絕對化，政府早晚被庸衆所劫持；同樣道理，人權也好、法治也好、平等也好、公正也好，一旦絕對化，天天被高調宣揚、成了空想烏托邦，也就必然成為政治的桎梏、政府的枷鎖，導致政治失去自主的行動能力，最終發生整體的衰敗。

“習式改革”是現成的實踐案例

對於這一點，西方一些有識之士也已經認識到了，關於自由和民主的變質、平等和法治的困境，以及政治的衰敗，都有了較深入的討論。而中國當前的“習式改革”，恰好為他們的理論研究提供了一個現成的實踐案例。

其實誰都明白，中國並沒有發現真理。中國之所以做對了，無非是憑經驗和常識避開了一些明顯的謬誤。從三十多年前開始，中國堅定地踏上了改革前行的道路，改革優先、改革挂帥，一切不利于改革、有礙于改革的東西都要讓路。

從這個起點出發，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實際上是被當作改革的障礙物，誤區甚至陷阱，而被拒之門外的。因為政治的決斷和自主、政府的威權和強勢，都是改革得以強力推進的必要條件，在攻關克難的關鍵階段，既不能被資本所綁架，也不能受到民粹的干擾。這就是一個很簡單的常識邏輯，只要本着實事求是的精神，誰都能發現。

反觀西方，實際上是干了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的蠢事。當初西方的崛起和全球統治的建立，當然不是靠觀念先行，更不是自由民主烏托邦藍圖的產物。但是後來為了搶佔道義高地，為其全球統治提供合法性基礎，甚至為其帝國主義行徑提供辯護，不得不將自由民主拉到絕對化的高度上，成了某種脫離實際的先驗原則。

結果，在國際上，雖然在意識形態軟戰上有效打擊了非西方國家，特別是社會主義國家，但同時也因為不得不實行雙重標準，製造了極大的混亂；而在國內，則差不多是殺敵一千自損八百，因為長期以來在人權、法治、平等、公正等標準上過於高調，導致了理想和現實的衝突無法調和，體現在少數族群和弱勢群體的騷亂抗爭持續不斷。

最嚴重的問題還是政治，由於受到來自經濟和社會各方面的多重壓迫，政治自主性完全喪失，改革也就只能流於空談。表面上是在回應所有方面的訴求，實際結果卻是什么也回應不了。

相比之下，由於排除了各種掣肘，中國的政治，幾乎可以游刃有餘地回應國家發展和人民生活各方面的要求。2015年的中國，由於提前兩三年就完成了政府的簡政放權，經濟力和社會力進一步釋放，中央政府的政治力也更加集中，“習式改革”有望在一種更加活潑、開放的局面中展開。

即使面前難題如山，只要改革在大步前行，高速前行，就一定勝利在望。

這就是中國特色的、以政治自主性為保障的全面深化改革。若從這個角度進行橫向比較，“習式改革”對於整個世界都有正面的示範效應。



BRENNAN, MAMMA & DIAMOND
ATTORNEYS & COUNSELORS AT LAW

美国 BMD 律师事务所
我们的律师经验丰富，祝您事业马到成功

www.bmdllc.com



美国 BMD 律师事务所

阵容强大的专业律师团队，数十年的法律执业经验，合理的收费标准，以及良好的信誉与口碑，确保您享有高质量的法律服务，保护您的法律权益免受侵害。

美国 BMD 律师事务所所在俄亥俄州及佛罗里达州共有 4 个办公室，拥有近 70 位专业律师，曾代理过政府部门、各类公司的复杂案件，赢得客户的信誉并享有极高的声誉。

精办各项法律业务：

- ◆ 商法以及公司法
- ◆ 移民
- ◆ 法律诉讼
- ◆ 证券交易
- ◆ 兼并收购
- ◆ 国际法、国际贸易与投资
- ◆ 房地产
- ◆ 医疗保障法
- ◆ 劳动雇佣法
- ◆ 遗嘱信托
- ◆ 知识产权
- ◆ 破产法
- ◆ 中文
- ◆ 英语
- ◆ 西班牙语
- ◆ 俄语
- ◆ 德语

徐佳佳 律师



作为一名在中美两国都受过系统法学教育的双语专业律师，徐佳佳律师了解中美两国的司法制度、理念、背景、渊源及其民族文化，这也使她能够更好地与客户沟通、了解不同客户的需求，并能为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业务的国际客户提供高质量的法律服务。

联系方式：

直线电话: 330-253-9195
直线传真: 330-253-9121
邮箱地址: vjxu@bmdllc.com
办公室地址: 75 East Market Street, Akron, Ohio 44308

蔣磊律師事務所

我們是一家位於俄亥俄州克利夫蘭市的國際性律師事務所。我們提供商務、公司、移民、知識產權、房地產、民事訴訟、遺產、離婚、刑事辯護、意外傷害、醫療失誤，以及中國業務等全方位的法律服務。我們的目標是以最合理的價格提供最優秀的服務。



蔣磊 律師
Lei Jiang, Attorney at Law

電話: (440) 835-2271;
電郵: info@leijianglaw.com

地址: Lei Jiang Law & Business Center 蔣磊律師樓
26943 Westwood Rd , Cleveland , OH 44145

蔣律師被 Super Lawyers 評為 2015 Ohio Rising Stars, an honor that is limited to no more than 2.5% of the attorneys in Ohio (只給不超過 2.5% 的年輕律師)。